

宋代政教关系

研究

汪圣铎 著

GUANXI ■ ■ ■ ■

YANJIU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宋代政教体系

研究

卷之三



宋代政教关系

研究

汪圣铎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邵永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政教关系研究/汪圣铎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5

ISBN 978-7-01-008589-0

I. 宋… II. 汪… III. 宗教-关系-政治-研究-中国-宋代 IV. B929.2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9416号

宋代政教关系研究

SONGDAI ZHENGJIAO GUANXI YANJIU

汪圣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47.25

字数:770千字

ISBN 978-7-01-008589-0 定价:99.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05BZS009

本书由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与河北大学历史学强势特色学科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出版缘起

河北大学的前身，是成立于1921年的天津工商大学，后改称天津工商学院、津沽大学、天津师范学院、天津师范大学。1960年定名为河北大学，1970年从天津迁至古城保定。河北大学的历史学科，创建于1945年天津工商学院的史地系，侯仁之院士出任首届系主任。聘请齐思和教授讲授中国通史，1946年9月至1948年先后由方豪、王华隆任系主任。1949年1月天津解放，钱君晔任系主任。1952年王仁忱出任系主任。1953年史地系分为历史系和地理系。在20世纪50—60年代，河北大学历史学科以拥有漆侠、李光壁、钱君晔、傅尚文、周庆基、乔明顺、葛鼎华等史学专家，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创办《历史教学》杂志而著称于世。改革开放以来，河北大学历史学科再创佳绩，获得全国第二批、河北省第一个博士点，建成河北省唯一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宋史研究会秘书处挂靠于此，并负责编辑出版《宋史研究通讯》。2005年以来，又获得中国近现代史博士点，建成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河北大学历史学科被评定为河北省强势特色学科，获得空前大的支持力度，迎来更新更好的发展机遇。在继续编印《宋史研究论丛》（CSSCI来源集刊）和《宋史研究丛书》的同时，我们决定隆重推出《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该丛书编委会成员除河北大学历史学强势特色学科建设领导小组外，主要有：郭东旭、刘敬忠、郑志廷、汪圣铎、张家唐、闫孟祥、刘秋根、刘金柱、吕变庭、杨学新、雷戈、肖爱民、肖红松等先生。

研究历史，教书育人，奉献社会，是我们的天职。

不吝赐教，日新月异，臻于完善，是我们的期待。

最后，衷心感谢各级领导和各位专家对本学科的长期厚爱和支持。特别鸣谢人民出版社对《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的鼎力襄助。

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
河北大学历史学强势特色学科建设领导小组
组长：姜锡东 成员：王菱菱、范铁权、丁建军

前 言

由于当初对困难估计不足，本研究课题的完成已经严重误期了，笔者终于意识到，必须使研究告一段落，不然将产生严重后果。

五年以前，笔者决心对宋代政教关系作一全面梳理，为此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找了一些人作助手，投入了巨大的精力。这当中，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研究课题被列入国家社科研究项目。但随后遇到原先未能想到的困难。首先是搜集和消化海内外研究成果的困难，其次还有寻找和消化相关现代理论的困难，最后还有阅读和消化佛经、道藏方面的困难。学识到用时方恨少，我深深地为自己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感到遗憾。

然而，努力总是有结果的。我相信，五年的艰苦努力不会白费。当我阅读自己的稿子时，一种喜悦的心情使我坚定了上述信念。

宋朝统治的时空范围内存在过的宗教不只有佛教、道教，但是这两教以外各教（如摩尼教）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所发挥的影响都远远不能同这两教相比。再加上笔者对这些较小宗教的研究很不够，所以，本书的讨论拟只限于宋王朝与佛教、道教的关系。

从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道教在汉代正式成为宗教，封建政权与佛教、道教势力之间就有如何相处的问题，就存在封建政权想要利用佛教、道教巩固自己的统治，佛教、道教试图利用封建政权减少自身发展障碍的问题，存在着彼此的不和谐、冲突与摩擦。经过几百年的调整，到了宋代，政教关系已趋于成熟和理性。佛教、道教中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与国家、社会对立是没有出路的，必须在现实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必须使统治者和广大民众都感到佛教、道教是社会生活切实需要的。在他们的带动下，佛教、道教为迎合这种需要也做出了相应调整，用今天人们习惯的表述，那就是佛教、道教明显地世俗化。与此相应，宋朝较有头脑的统治者，较有头脑的士大夫，也已认识到：完全消灭佛教、道教在当时是根本不现实的。宋人张方平讲：“今天下十室之邑必有一伽蓝焉，衡门之下必有一龕像焉，异巷朋处，喜相祝、怒相诅，一话一言，必以浮屠之言为证。少而习闻，长而习见，如之何其不沦胥以入其流也。是以源深而脉长，根固

而枝茂，其徒满于天下而人不知厌苦，国家之帑藏耗于上，百姓之财力竭于下，以人主之威权，发愤而芟夷之，才息而复炽，以正士之辩智，扼腕而深议之，言出而罪及，是以其徒益张……今释老之游者略举天下计之及其僮隶服役之人，为口岂啻五十万。”^① 佛教在当时已有如此的实力，要想简单地取缔显然是不可能的。道教的势力虽不如佛教，但在百姓心中的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

明智的作法是引导它们使其为己所用。官方朝此方向作出了一定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传统儒学也包含宗教的内容，但儒学的宗教内容不够丰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内容显得枯燥和乏味，尤其在勾通神（天）、人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佛教、道教在这方面却有着明显的长处。所以，我们看到，佛教、道教在勾通神、人，彼岸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正是当时的统治者所需要的，也是当时社会所需要的。不管佛教、道教的原始教义是怎样的，就宋代它们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两种宗教如不加控制，还是可能产生一些不利当局、不利社会的东西的。这两教都有蔑视封建伦理的内容，这与效忠君王有抵触，与强化社会秩序有抵触。这两教鼓励人们出家，这些出家人都不再能赡养老人和小孩，这些出家人不可能都完全自食其力，这些出家人也希望自己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这些都会给社会增加负担，都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宗教势力也存在着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势力的可能，这就会对世俗统治者构成威胁。因此，对佛教、道教的发展给予必要的控制也是势所必然的。

对宋代政、教双方在互动方面的各种举措进行具体分析，总结其成功与失误，是本课题的任务。我们的研究设想是对宋代政教关系作全面地研究，但是摆在众人面前的研究成果却似乎不是那么全面、系统。这是因为，我们发现，本领域诸多方面前人的研究是相当到位的，要想有较大突破、超越是很困难的，而重复讲前人已讲的话则是毫无意义的。这就使得本研究成果的全面、系统性受到局限。

此外，本成果显然也受到笔者水平的局限，尤其是涉及宗教教义方面的内容，本书都不敢过多讨论，以避免伴随而来的较多失误的出现。对国外学界的一些流行观点，本书的讨论也不多，这是因为笔者外语水平有限，很怕因对某些论著的理解上有偏差而影响结论的正确性。这些都是笔者想要先在这里向读者老实交待和说明的。

^① 张方平《乐全集》卷一五《乌菟论·食货论·原蠹中篇》。

目 录

《河北大学历史学丛书》出版缘起	1
前 言	1
第一章 宋太祖、太宗时期的宗教政策	1
第一节 宋太祖对后周偏激政策的纠正	1
第二节 宋太宗对佛教的尊崇	8
第三节 宋太宗尊崇道教	18
第二章 宋真宗的以神道设教	36
第一节 天书降与东封西祀	36
第二节 圣祖临与尊老子、玉皇	52
第三节 平衡三教的努力	65
第三章 渐变与衡定——宋仁宗时期	79
第一节 尊崇道教的降温	79
第二节 刘太后与佛教	87
第三节 宋仁宗与一些著名僧人的交往	92
第四节 宋仁宗倾向佛教与儒学复兴	106
第四章 相对平稳和低调——宋英宗、神宗、哲宗时期	115
第一节 智缘及围绕西部战事的宗教活动	115
第二节 建中太一宫及道士陈景元	123
第三节 相国寺改造及僧宗本等	129
第五章 崇道抑佛——宋徽宗的合一三教	140
第一节 佛、道并重阶段（即位至崇宁末）	140
第二节 崇道升温阶段（大观元年至政和六年）	154
第三节 林灵素与狂热崇道阶段	173

第四节	宋徽宗三教合一的设想与举措	193
第五节	崇道的降温与收敛	207
第六章	新的平衡——宋高宗、孝宗、光宗时期	213
第一节	宋高宗的疏远释道	213
第二节	宋孝宗对佛教的偏爱	226
第三节	宋孝宗与道教	237
第七章	理学阴影下的政教关系——宋理宗在位时期	241
第一节	修建宫观寺院及资助、赐田免税役	241
第二节	撰写褒扬佛道的文字、为寺院宫观题辞	246
第三节	与僧人道士交往	252
第八章	引导与认同——三教调和论占主导位置	261
第一节	官方的引导	262
第二节	意识形态中占主导地位始终是三教调和论	265
第九章	宋朝的内道场	276
第一节	宋朝皇宫内常常举行佛、道教道场	276
第二节	宋朝在皇宫内举行道场的缘由	281
第三节	宋朝皇宫内举行道场和进行宗教活动的地点	289
第四节	宋朝内道场长期存在的意义	295
第十章	祈雨晴、保丰收——为国效忠的重要途径之一	297
第一节	宋代统治者对借助佛道水旱祈祷的特殊重视	297
第二节	地方官在各地进行的水旱祈祷	307
第十一章	为皇家祝寿——为国效力的又一重要途径	318
第一节	京师为皇家祝寿	318
第二节	地方为皇家祝寿	326
第三节	僧人为皇家祝寿	334
第十二章	为皇家祈冥福、为国家禳灾除祸	343
第一节	佛教、道教在国丧、国忌中发挥作用	343
第二节	禳灾除祸	357
第三节	官方举行的其他与佛教道教联系的祈福禳灾活动	366

第十三章 出家僧道的管理	377
第一节 严把入门关——关于僧道度牒颁给管理的再讨论	377
第二节 宋代僧人受戒制度研究	385
第三节 宋代勒令僧道还俗的立法	398
第十四章 荣誉与地位的引导——关于紫衣师号的颁给的 研究	406
第一节 关于圣节颁赐紫衣师号的几个问题	406
第二节 关于佛、道教圣地及重要寺观紫衣师号的定额颁给	411
第三节 关于非定时颁给紫衣师号	413
第四节 赐僧金襴袈裟及亡僧赐谥号、塔名	423
第十五章 宋代敕赐处士号考辨	429
第一节 得赐处士称号者，大多数是隐士	429
第二节 处士是否是道士师号	434
第三节 宋徽宗时期几位得赐处士号者的事例分析	438
第十六章 南宋御前宫观的高士	445
第一节 南宋时期设有高士斋的宫观	445
第二节 叶绍翁言及诸高士行迹	448
第三节 其他诸高士行迹	454
第十七章 网络的完善与被分割——宋朝僧道官制度	462
第一节 僧官与道官体制	462
第二节 僧道官之选任	469
第三节 寺观主首与寺观僧道职	475
第十八章 寺院宫观的管理制度	497
第一节 宋朝严格限制创建寺观	497
第二节 官方根据需要创建寺观	500
第三节 禁止创建寺观留有缺口	501
第四节 关于宋代私创寺观数量的估定	505
第五节 寺观改制要经朝廷批准	506
第十九章 宋代的年号寺观与圣节寺观	510
第一节 北宋的年号寺观	510

第二节	宋代以“圣节”命名的寺观·····	525
第二十章	佛、道为孝道服务的体现——功德寺观 ·····	535
第一节	关于“功德坟寺”的定义等·····	536
第二节	关于享受功德寺观者的范围·····	538
第三节	关于功德寺观免税役·····	543
第四节	关于功德寺观住持选任·····	546
第五节	关于功德寺观存在和发展的意义及影响·····	549
第二十一章	掌控重点 占据上游——北宋官方直接经营部	
	分寺院 ·····	554
第一节	宋朝官方与相国寺·····	554
第二节	宋朝官方对开宝寺、太平兴国寺的经营·····	558
第三节	宋朝官方与启圣院、应天院、兴德禅院·····	567
第四节	宋朝官方与奉先寺、普安院、宝相院、慈孝寺·····	575
第五节	北宋皇家坟寺·····	581
附录一：	南宋泰宁寺·····	585
附录二：	宋代官方出资建宫观寺院区数表·····	587
第二十二章	居于主导地位的官宫观 ·····	590
第一节	官宫观的特征·····	590
第二节	玉清昭应宫·····	596
第三节	宋朝原庙景灵宫·····	597
第四节	诸太一宫·····	614
第五节	上清宫、寿星（崇先）观、上清储祥宫·····	624
第二十三章	宋代的天庆观 ·····	631
第一节	宋代各地天庆观的建立·····	631
第二节	官方对天庆观的优待·····	634
第三节	官员朝拜及举行法事·····	637
第四节	天庆观的内部结构·····	641
第二十四章	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本命殿 ·····	643
第一节	宋代寺院宫观中的御书阁·····	643
第二节	宋朝官方（皇家）与本命信仰·····	646

第三节 寓于宫观的本命殿、元命殿、元辰殿	650
第二十五章 宋王朝与佛教名圣地及名寺院	654
第一节 宋王朝与五台山佛教	654
第二节 宋王朝与峨眉山佛教	660
第三节 宋王朝与泗州僧伽塔	667
第四节 宋王朝与明州诸山寺院	681
第二十六章 赏赐不广 限制不严——僧道寺观田产问题	
研究	692
第一节 宋朝禁止寺观购买耕地及制度缺欠	692
第二节 关于宋朝敕赐寺院田产	695
第三节 宋代宫观赐田研究	706
第二十七章 与民同负 有限减免——关于寺观、僧道的	
赋役	716
第一节 关于寺观蠲免田赋	716
第二节 关于僧道寺观免役免科敛等	722
主要参考文献	727
后 记	744

第一章 宋太祖、太宗时期的宗教政策

关于宋太祖、太宗时期官方与佛教、道教的关系，前人已有论及，其中似以日本竺沙雅章、内地李裕民先生、台湾黄启江先生的研究最为深入。^① 以下拟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再作些讨论。

第一节 宋太祖对后周偏激政策的纠正

一、宋太祖对后周世宗过度排抑佛教政策的调整

周世宗在位时期，对佛教采取了排抑措施，他于显德二年（955）下诏规定：除有敕额寺院外，每县只许存留僧寺、尼寺各一所，其余拆毁。这一规定实施的结果是周朝辖区内只保留了寺院 2600 余所，被毁的寺院竟有 3 万余所。^② 周世宗又以实行铜禁为名，下令熔毁寺院铜佛像。北宋人杨亿讲：“周世宗悉毁铜佛像铸钱，谓宰相曰：佛教以为头目髓脑有利于众生尚无所惜，宁复以铜像为爱乎！镇州铜大悲像甚有灵应，击毁之际，以斧钁自胸铲破之。太祖闻其事。后世宗北征，病疽发胸间，咸谓报应。太祖因重释教。”^③ 杨亿是个笃信佛教之人，所讲因果报应之事自不足信，但讲宋太祖对周世宗过激做法及其不良后果有些认识，则是可能的。

宋朝立国之初，建隆元年（960）六月，宋太祖在平定李筠叛乱之后所颁

^① 竺沙雅章著、张其凡译《宋初政治与宗教》，原载日本同朋舍 1989 年版《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文集》，译文收入《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三集，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张其凡《宋代典籍研究》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年版。李裕民：《论宋初的佛教政策》，收入《中国佛教思想与文化》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又收入《宋史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黄启江《北宋佛教史论稿》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31 至 67 页，第一章《宋太宗与佛教》。

^② 参《旧五代史》卷一一五《周世宗纪》，《五代会要》卷一二《寺》。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八注引《杨氏谈苑》，中华书局 2004 年新 1 版。

“德音”诏书中，就下令“诸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①这一命令表明，宋太祖已开始着手纠正周世宗的过激政策。随后，乾德四年（966），有僧人控诉河南府进士李霭（一作藹），言其“不信释氏，尝著书数千言，号《灭邪集》，又缉佛书缀为衾裯”，“河南尹表其事”，宋太祖乃下令将李霭“决杖配沙门岛”^②。本来有人信佛教，有人反对佛教，这都是个人私事。但现在官方对反对佛教者处以刑罚，明显地表示出向佛教示好的态度。乾德五年（967）七月，针对后周“诸道铜铸佛像悉辇赴京毁之”的做法，宋太祖特下“诏勿复毁，仍令所在存奉，但毋更铸”^③。上述情况表明，宋太祖已改变了后周世宗排抑佛教的政策导向。

宋太祖对佛教的尊崇，还表现在对佛教徒赴西土取经及对佛经的态度上。南宋范成大记：“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多叶书”。^④如所记无误，则这是官方派遣庞大的僧侣使团到天竺。“乾德三年十二月，沧州僧道圆诣西域（《佛祖统纪》谓游五天竺）还，表献贝叶梵经四十二夹（按：据《文献通考》道圆还携回佛舍利一水晶器），道圆……住天竺六年……太祖召问所历山川道里，赐紫衣、器币，馆于京寺。四年三月，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请游西域取经，各赐钱三万遣之”^⑤。说明宋太祖对佛教徒赴西土取经采取支持鼓励态度。乾德四年六月，宋太祖“诏西川转运使沈义伦于成都写金银字《金刚经》，传置阙下”。开宝四年，宋太祖下令刊刻佛教大藏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官方刊刻全部佛经。此次所刊即《开宝藏》，共13万多板、6600多卷，至宋太宗初年才完成。开宝年间，知鄜州王龟从组织梵僧与汉僧共译佛经，“始出《无量寿》、《尊胜》二经、《七佛赞》……献经阙下，太祖召见慰劳，赐以紫方袍”^⑥。又有记载：“〔乾德五年〕右街应制沙门文胜奉敕编修《大藏经随函索隐》凡六百六十卷。”^⑦可知宋太祖对译经及整理佛藏也持鼓励态度，这对后来译经院的

① 《长编》卷一。释志磐《佛祖统纪》卷四三又载：诏令规定“其已毁寺所有佛像许移置存留”，且谓“于是人间所藏铜像稍稍得出”。

② 《长编》卷七。

③ 《长编》卷八。

④ 《吴船录》卷上。

⑤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道释二之五，参《长编》卷七、佚名《枫窗小牋》卷下、《文献通考》（以下简称《通考》）卷三八《四裔考》、《佛祖统纪》卷四三。

⑥ 《长编》卷二三。

⑦ 《佛祖统纪》卷四三《法运通塞》。

建立有直接的影响。

宋太祖在位时期，官方还投资修建或扩建了一些寺院，主要有扬州建隆寺、开宝寺、龙兴寺（即后来的太平兴国寺）。其中建隆寺为宋太祖征讨李重进的行宫改建，此开宋代皇帝巡幸处建佛寺之先例。开宝寺系开宝三年（970）二月将原封禅寺改扩建而成。据载：“修旧封禅寺为开宝寺，前临官街，北镇五丈河，屋数千间，夺数坊之地，极于巨丽”。^①说明此寺扩建后规模宏大，官方投资颇巨。龙兴寺，或作隆兴寺，宋初已废而不存。杨亿谓：“太平兴国寺，旧龙兴寺也。周世宗废为龙兴仓。国初，寺主僧屡击登闻鼓求复为寺。上遣使持剑以谓之曰：此寺前朝所废为仓廩以贮军粮，汝何故烦渎帝庭，朝命断汝首。仍戒之曰：傥偃蹇怖畏即斩之，或临刑无惧即未可。既讯，神色自若……上大感叹，复以为寺。”^②杨亿信佛，溢美佛徒之辞未必可信，但所言龙兴寺在周世宗时已改为粮仓应是属实的。高承又引《宋朝会要》：“唐龙兴寺也，开宝二年诏重修，太平兴国元年赐今额。”^③李焘则记：开宝八年（975）十一月，“新隆兴寺成，凡五百六十二区。丙申，车驾临视。”^④可见新重建的龙兴寺规模也较大，宋太祖且亲临视察，说明对此寺的重视。

宋太祖还于乾德二年（964）在其父旧陵地处建造了奉先资福禅院，于乾德四年“敕内侍张重进往峨眉山普贤寺庄严佛像”^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对佛教的尊崇。

二、宋太祖对道教也持尊崇态度

宋太祖对道教的尊崇，突出地表现在他于宋初遣使祠老子、下令修建建隆观及同一些道士的交往上。李攸记：

建隆初，太祖遣使诣真源祠老子，于京城修建隆观。观在闾闾门外，周世宗建，曰太清观，帝命重修，赐今名。自是斋修率就是观。^⑥

①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四三《仙释佛道》。

② 高承《事物纪原》卷七《真坛净社部三十六》引《谈苑》。

③ 高承《事物纪原》卷七《真坛净社部三十六》。

④ 《长编》卷一六。

⑤ 《佛祖统纪》卷四四《法运通塞》。

⑥ 李攸《宋朝事实》卷七《道释》。

北宋人高承记：

建隆观，钱易《洞微志》曰：周显德中，营道宫于皇城之西梁门外，赐为太清观。太祖有天下，始重饰之，因改为建隆观。^①

可知建隆观原名太清观，是周世宗所建，宋太祖重修，改名建隆观。明代人李濂记此观“总一百四十有九区”^②，这同此后建的玉清昭应、景灵等宫观相比，规模要小得多，但在宋初，或许已是相当宏壮了。

建隆观竣工后，宋太祖曾邀请隆兴观道士苏澄隐（或作苏澄，误）主持此观，遭到婉拒。后来宋太祖曾向苏澄隐请教养生之道，苏答道：“臣养生不过精思炼气耳。帝王养生则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尧享国永年，用此道也。”^③宋太祖听了很高兴，大约是认为一位道士能讲出这样一番治国的大道理颇不简单，于是“赐衣一袭、银器五百两、绢五百疋”，又“赐号颐素先生”^④。

宋太祖很欣赏来自川蜀的老道士刘若拙，任命他为左街道录，刘若拙“自号华盖先生，善服气，年九十余不衰，步履轻疾，每水旱必召于禁中设坛场致祷，其法精审，上甚重之。”^⑤从引文也可看出，宋太祖在位时期已常常在皇宫中举行道教道场。宋太祖晚年曾“赐道士玄秘大师马志通议大夫阶”^⑥，给道士授普通官散阶，也是一种非常之举，然而却是因其治宋太祖弟赵光义病有效，看不出与道教有多大联系。

三、宋太祖对佛教、道教的制约

欧阳修谓：“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

① 高承《事物纪原》卷七《真坛净社部三十六》。据上引，太清观改名建隆观应在宋初，但令人不解的是，《长编》、《宋史·太祖纪》都记宋太祖于建隆三年多次亲赴“太清观”祈祷，而不记太清观改名建隆观之事。二书初载“建隆观”均系乾德五年。时距开国已八年。而王应麟《玉海》卷一〇〇《郊祀祠宫观附》所载更是自相矛盾。原因待考。

② 《汴京遗迹志》卷一〇《寺观》。

③ 《长编》卷一〇开宝二年闰五月壬申。

④ 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五六《承明集四·经筵故事二》，参《豫章文集》卷二罗从彦《遵尧录·太祖》、释文莹《玉壶野史》卷一。按：另关于宋太祖与苏澄隐的交往，《宋史》卷四六一《列传方技上》、江少虞《事实类苑》卷四四《旷达隐逸》、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一八《隐逸传》、曹彦约《经幄管见》卷四、《宋史全文》卷二等处也都有记载，记载之多，说明宋太祖与苏澄隐的交往对后世影响颇大。

⑤ 《长编》卷一三、《宋朝事实》卷七宋李攸撰《道释》。

⑥ 《长编》卷一三。